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 册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 华 书 局

1983年·北京

辛亥革命期间的上海群众运动

郭 豫 明

七十年前，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祖国大地，上海同样受到强烈震动，群众运动的怒潮高涨起来了。各界人民满腔热情地投入光复之役，而后又从各方面继续支持革命，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而斗争。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群众运动的勃兴，是当时全国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品格特点。

一

上海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过长期的战斗。上海光复之役，正是这些斗争的继续与发展。

从二十世纪初年起，上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呈现出异军突起的新趋势，主要有拒俄、拒法运动、《苏报》案和反美爱国运动等，影响遍及全国。一九〇一年在张园集会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有数百人，他们慨然表示：“东三省者，中国人之东三省，非俄人之东三省。俄欲夺之，我必复之。”两年后再次于此召开的“拒俄大会”，人数增至一千多，大会向全世界严正宣告：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退兵新约，使“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表达了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刚强决心。一九〇三年绅商学各界人士四、五百人在张园举行“拒法大会”，坚决

要求清朝政府阻止法军踏进广西，并罢免引狼入室的广西巡抚王之春职务，他们接着又号召全国人民罢市、罢工，给予声援，务期达到目的。同年发生的《苏报》案，虽然直接关联的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但章炳麟、邹容响亮提出的反清革命主张，成了时代的强烈呼声。一九〇五年的反美爱国运动则扩大到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民，连妇女、学童都相约不用美货，他们“热血涌如潮”，不怕大洋里“风急浪头高”！这些斗争使人民群众经受锻炼，为上海的光复安下了奠基石。

一九〇五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盟会成立后立即在上海设立分会。革命党人创办学校，出版报纸，开展革命宣传，争取群众，积聚力量。一九一一年七月，李燮和组织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总机关，秘密筹划起义。与此同时，宋教仁、陈其美等发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沪正式成立。他们以《民立报》为阵地，加强宣传鼓动工作，揭露清朝政府的累累罪恶，歌颂革命党人的英勇斗争，扩大民主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和革命党人不同，资产阶级立宪派热衷于利用清朝政府所开放的一些权力搞地方自治活动，一九〇五年设置“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修马路、架桥梁、装路灯、扫街道、办民团等工作，接着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等组织与体育团体。一九〇七年，五个体育团体组成南市商团公会，由李平书任会长，配备枪支弹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随后，商团在各地区各行业迅速发展。一九一一年三月，由二十余个行业性和区域性的商团正式组成上海商团，这个地方自治机关控制下的武装团体，其中成员大多数是中小商人及其子弟，也有店员、职员参加，他们自然易受时代潮流的推动。

这一时期，工农劳苦群众为反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也不断开

展斗争。自一九〇五年后,工人罢工连绵不绝。当年有集成、裕源、华新纱厂与英翰印书馆等工人的罢工;一九〇六年有瑞纶丝厂、煤气公司、英美烟公司和印染业、成衣业工人的罢工;一九〇七年有济中纱厂工人烧毁棉花的斗争;一九〇九年有裕慎、勤昌、同协祥、新大等丝厂女工的罢工;一九一〇年有元丰、瑞顺、久成、恒丰、裕康等丝厂和自来水公司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扣发拖欠工资与延长工时等,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同工人罢工相呼应,乡镇的抢米风潮和抗捐斗争也相继爆发。一九〇七年,松江泗泾、上海虹桥、野鸭墩、庄家泾、浦东六里桥及青浦都发生饥民抢米事件;一九〇八年,上海闵行乡民为反对增加捐税而扣留厘卡司事;一九一〇年,上海吴淞船户群起抗捐,奉贤煮盐为生的灶户“因饥滋事”。一九一一年初至武昌起义前,社会动荡不安,银根浮动,米价飞涨,矛盾尖锐。据载这一期间工人罢工约有八至十次,比以往明显增加,有的规模也较大,如晋昌、长纶、锦华、协和等丝厂罢工女工达二千多人;浦东烂泥渡地方发生抢米风潮;英、美租界商民要求减免房租“相率罢市”,南市地区也为减租而停止交易。武昌起义后,由于长江水运被切断,市面萧条,现银短缺,不少纺织厂“颇难支持”,而且因武汉各处纸币不能通用,商店均用现银交易,致使钞票急速贬值,银价暴涨,金融更形混乱,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群众无以为生,清朝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革命时机成熟了。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从舆论和组织两方面加紧工作,促使形势向前发展。舆论方面,他们以其喉舌《民立报》来鼓吹革命,并联络其他报纸进行宣传鼓动。他们谴责清朝政府“坚持‘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主义”^①,是一个倒行逆施的“万恶政府”^②;申明“革

① 1911年10月31日《民立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下同)第49页。

② 1911年10月13日《民立报》,见《选辑》第29页。

命党之起也，因恶政治之恶劣”，目的“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①；指出“今天下纷纷，未能及时底定，全赖四万万人一德一心，艰难缔造，共抒精诚，克成大业，使中华共和国旗，遍耀于日之出没处”^②。并且刊载革命消息，反响很大。“报纸一出，购者纷至，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③报馆门前，“攒首万人”，“伫望消息”^④。人们闻革命军获胜则喜，受挫则忧，同革命军声息相通，命运与共。湖南、江西等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消息传来，更使上海人民深受鼓舞。“人心鼎沸，伫待易帜，如大旱之望云霓也”^⑤。

革命党人在组织方面，主要是编练武装队伍。商务印书馆许多工人加入他们组织的义勇军，文明书局的职工参加秘密军事训练，工人、贫民等三千多人投身于张承樞的敢死队，据回忆说，还有“热心革命的学生、工人、小商贩等自行组织”敢死队和国民军^⑥。这些武装队伍，是上海起义的中坚力量。同时，革命党人极力争取军警与商团转向革命。李燮和联络吴淞和闸北军警，陈其美疏通沪军营、炮队营及商团等，使之脱离敌人营垒，加入革命行列，化阻力为动力。军警士兵与商团团员后来在光复之役中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此外，革命党人还联合上海各社会团体组成中国国民总会，该会所创立的军事组织以后也参加光复上海的斗争。

总之，由于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党人活动的加强，广大人民的革

① 1911年10月16、17日《民立报》，见《选辑》第32页。

② 1911年10月30日《民立报》，见《选辑》第48页。

③ 沈焕唐：《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第48页。

④ 张篋溪：《辛亥革命征信录》，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204页。

⑤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见《选辑》第146页。

⑥ 王时泽：《接洽上海海军反正和组织海军陆战队会攻南京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51页。

命积极性普遍增长。这样，上海的光复就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

上海人民在光复之役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上海起义了。当天中午（一作上午）闸北首先发轫，军警士兵轰然而起，商团配合，未经战斗即告成功，随后商团出队接管沪宁车站。闸北光复不久，下午四时，县城方面也开始行动，数千人在九亩地决然誓师，后分两路进攻县城衙门与江南制造局。商团未遇抵抗，很快接管道、县衙门，道台刘燕翼、县令田宝荣遁入租界，商团便派人在城门悬挂白旗和革命军旗，城中遍贴告示，安定社会秩序，深得民心。“树旗之时，群众鼓掌欢呼，声隆如雷。维时商店照常开市，人民熙攘往来。”^①各校学生组织队伍，维持治安。

陈其美率张承樞等敢死队百余人攻打江南制造局。制造局是清朝政府的一个重要兵工厂，储存大批军火，正准备运往湖北镇压革命军。所以敌人特调军队前来防守，且有兵轮数艘在黄浦江中巡逻保护，还在江滨设排炮，要口设水机关枪，大门设小钢炮，戒备森严。这样，进攻制造局就成为上海光复的决定性一战。人民群众热情投入这场战斗。当敢死队往攻制造局时，沿途有不少市民、学生随同参加。五时许，敢死队乘工人放工之际，发起攻击。这时在制造局前门一带，成千上万的人，手拿着明火枪、四瓣火枪、猎枪、羊角叉、大关刀、长矛等各式各样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拥来，对制造局形成一个包围圈。他们“发喊助威，震天动地，声势实足慑伏敌人”^②。因此，敢死队虽首次进攻遇阻，被迫撤退，而制造局总

①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见《选辑》第150页。

② 王子骞：《攻占上海制造局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9页。

办张士珩见“局外民人太多，疾飭收队”^①，不敢乘势追击，敢死队仅死数人、伤数人（一作死伤五十余人）、被捕数人（包括陈其美，他次日被救出），没有遭受过多的损失，否则“将无一人生还”^②。他们退到警察学堂休息，“该校教员学生格外殷勤照拂”^③，数千市民也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毅然请缨，誓死赴敌，使得受挫的敢死队士气复振，坚定了反攻的信心与决心。再次进攻的队伍准备出发时，一些商民还组成慰劳队，携带面包、馒头、茶水、水果等前来犒劳，表示对革命的拥护。

第二天凌晨，李燮和带领巡防营、沪军营、闸北警士、水师营会同敢死队及商团再攻制造局。其时“持械围局的民众似较昨日更多”^④，伶界潘月樵等许多人踊跃参加，妇女尹锐志、尹维俊等人也来相助。制造局附近一个小店的老板见队伍强攻不易得力，建议火攻，并捐了十几听火油。制造局的工人出力尤多，有的“潜卸炮臼，持以来献”^⑤；一些已放工出局的工人重新回来投入战斗，眼看队伍受阻于前门，他们便带队绕至局后^⑥，“从炮弹厂后面矮墙，一律跃进局内”^⑦；知道军械库所在处的工人，“均拆墙翻身而入”^⑧，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页。

②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下同）第287页。

③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下同）第288页。

④ 王子骞：《攻占上海制造局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9页。

⑤ 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商团同志会：《上海商团小史》，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89页。

⑥ 《上海商团小史》谓系熟悉局址途径的商团团员带路（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88页），或亦可能，但主要是工人领路，似无疑问，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288—289页。

⑦ 《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见《选辑》第142页。

⑧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289页。

先后打开步枪库与子弹库；留在局里的工人也主动配合，该局工人回忆道，革命军从黄浦滩上冲破木栅，逼近制造局木工厂，正在厂里的“莫宽老师傅看到一个个背着大枪，臂缠白布的革命军，便协助他们一起将木栅门打开”，并为他们领路，“控制厂内天、地、玄、黄等八个火药库，得到很多枪枝，武装了工人。这样，制造局工人便和外面的革命军内外夹攻”^①；局内工人又火烧张士珩的住宅。攻入局里的队伍也举火焚厂。“守者见局内火起，惊乱无斗志”^②；加之革命党人事前已对局内部分守军作好通款联络工作，“新调护局巡防营观望不前，炮队营屡调不出”^③，张士珩见大势已去，带了亲信数人乘小火轮仓皇逃往租界。局外进攻队伍遂汹涌而入，残余守军纷纷投降。九时许，制造局全部占领了，上海市区亦告完全光复。

同日，黄汉湘在吴淞发动士兵起义，宣布独立。清朝在沪的海军各舰艇因为失去根据地，当天升悬白旗，归附革命。宝山、青浦、松江、嘉定、金山、奉贤、南汇、川沙和崇明等地也于十一月上旬相继独立。至此，上海附近地区全告光复。

上海光复后，临时革命政权即以“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上海军政分府”等名义发布文告，十一月六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上海的光复，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使得它失去一个重要财源，又使它的陆、海军得不到江南制造局的军火供应，后来汉口清朝海军投诚，与吴淞独立也有密切关系。《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记载：“萨镇冰海军主力之在汉口者，亦以失上海制造局，而不得资械弹以继军火，情见势绌，而成坐困，未几亦降，则以黄汉湘之先扼

① 《江南造船厂工人回忆录》，见《选辑》第676页。

② 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商团同志会：《上海商团小史》，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88页。

③ 故宫档案馆：《江苏起义清方档案》，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93页。

其吭而发难于吴淞也。”^① 清朝政府既然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上海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基地，因而上海的光复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大打击。

事实表明，上海人民是向往革命的，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的。多少年来，他们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苦，渴望解放。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的关于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奋斗纲领，的确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表达了人民的意愿。所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坚决拥护，他们积极投入斗争，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列宁指出：“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② 上海起义之所以迅速胜利，社会秩序之所以很快稳定，都是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就以攻占制造局之战来说，胜利的取得，固然是由于参加进攻的敢死队、军警士兵及商团团员等的勇敢奋战，但也得力于其他群众尤其是制造局工人的多方支持。他们同仇敌忾，协力作战，终于攻克清朝在上海的这个顽固堡垒，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清朝“人心已去，纵有长城，亦不足恃矣”^③。显而易见，上海人民在光复之役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三

上海光复后，广大人民继续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反清的群众

①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47页。

②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426页。

③ 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商团同志会：《上海商团小史》，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89页。

运动进一步向纵深方面迅猛发展。

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为了满足军事需要，龙华火药厂和江南制造局的工人迅速生产军火，先后都加开夜工，连假日也照常工作。因而枪炮子弹产量骤增，制造局“每日出枪之数，较之从前，可增数倍，而炮位亦已制就多尊，以便赶运前敌应用”^①。制造还试制炸弹，并派工匠前往南京，修理攻宁的江浙诸省联军中损坏的枪炮，直接支援前线的对敌斗争。电报局的工人曾议决只为革命军办事，凡光复的地区，电报照常往来，而未光复的地区，如由南京、芜湖发往北京的电报均一律搁起，以切断前线及其他地区同清朝中央的电讯联系。

各界群众则纷纷组织军事团体，准备参加武装斗争。当时，各种军事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据报刊记载：制造局工人组织工匠保卫团，“夜间排队出巡，以保治安”^②；学生血气方刚，决心投笔从戎，成立的团体较多，有中华学生军、学生北伐队、学生军、学生守卫团、中华民国学生军团、学生北伐团、国民军北伐团、志愿决死团、义务宪兵队、中华民国北伐先锋队、十字军北伐队、沪宁北伐义勇军、铁血团、中华民国义军等，加入者络绎不绝，如中华民国学生军团（或称苏浙学生军团）筹组时，“不旬日间，自愿参加者千余人，多系江苏、浙江两省中学以上学生”^③。他们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界同人具受教育，负任尤重”^④；妇女也跃然奋起，组成女民国军、女子北伐光复军（或称敢死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等团体，她们认为，“一国兴亡，匹妇亦

① 1911年11月16日《申报》，见《选辑》第678页。

② 1911年11月21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79页。

③ 田颂尧：《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浙学生军团》，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56——57页。

④ 1911年11月10、13日《民立报》，见《选辑》第563、565页。

肩责任”^①，决心步花木兰、左良玉之后尘，当巾帼英雄；外省旅沪人士组织的团体有河南北伐军支部、旅沪湘人北伐队、江西北伐队、直豫皖三省北伐军、蜀汉军、川滇黔桂四省北伐军等，这些团体有的同时有促成本省独立的意图，如蜀汉军就提出“集合全力促成四川独立”^②。

上海人民又踊跃投军，掀起了参军热潮。十一月五日，上海军政府办事处传出招兵消息，青年立刻前去报名，“不崇朝而已盈额”^③。闸北巡警总局机关部出示招军，应募者很快就达数百人。十一月六、七日，军政府遣员至美租界一带招募，两天即有数百人应招。十一月中旬，吴淞炮台派人至沪招募步兵三营，“只一星期业已募有二营，约有一千余人之谱”^④，其余一营也迅速补足。当时沪军、光复军均扩充队伍，有四个师，总计入伍人数在四万人以上。在参军热潮中，工人、学生表现得很出色。上述的江南制造局工人莫宽等随后都参军，投身革命。十一月七日有“广潮帮工人一百余人齐赴军政府报名，愿充敢死团”^⑤。在上海军政府办事处所招的兵士中，“学生界人物为最多”^⑥。留日学生二百数十人也于十一月中旬启程回国，到沪投效以襄军事。还有不少商人报名从军。甚且有的和尚“也愿抛了经卷，脱了袈裟，为战场上的健儿”，他说自己“是国民一分子，岂能不出一分子之力”^⑦，毅然投入现实的斗争。

当时清朝政府尚作垂死挣扎，正向湖北武汉地区反扑，因此武装斗争乃是当务之急。上海人民纷纷组织军事团体和踊跃参军，

① 1911年11月13日《申报》，见《选辑》第588页。

② 1911年12月15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08页。

③ 1911年11月6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09页。

④ 1911年11月23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11页。

⑤ 1911年11月8日《时报》，见《选辑》第677页。

⑥ 1911年11月6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09——610页。

⑦ 钱化佛述、郑逸梅记：《攻宁记》，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81页。

正是适应形势的需要,起了壮大革命声势,增强革命武装力量的作用。

群众对革命的支持,还表现在募捐助饷方面。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实行的厘金和百货落地税等,财政开支依靠兴办中华银行发行军用票、发行公债票及募捐等三种办法。为此,各界人民广泛开展募捐运动。商民成立了馈送军食联合会、节费助饷会、售物助饷会、军事募捐团等组织,从事募捐工作。各行会和帮会曾集会捐款。如油豆饼业议决“按照缴纳厘金之数,九折抽饷”^①;木行业决定“参照从前树木捐章程,减去二成,按月汇解”^②;绍酒业也议定“照从前捐章减去二成,按月征银洋五百元”^③,可见他们是把免税的一大部分作为捐款的。泉漳会馆先捐军需五千元,继又“议决以三个月租金移助饷需”^④。有的商号则捐助了巨款。

工人、学生、教师、新闻出版职工、医生和文化界、艺术界、宗教界人士,以及妇女、儿童等也都尽力捐献。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捐输“非常踊跃”^⑤,其中炮厂工匠一次就有一百八十多人共捐二百六十三元。海生轮船船员发起自由助饷会,一次也捐了英畝六十元。学生成立宣讲社与游艺募饷团,进行宣传 and 文艺演出,募集捐款。和安小学、育贤女学堂、中西学堂、圣约翰学堂、南洋中学等许多学校师生争先捐款助饷。《民立报》社职工相约各以月俸十分之二汇缴。医界成立助饷团,议决“每月每人担任月捐一次,以助民军饷项”^⑥。文化界也组成文人助饷团从事募捐,有的以出售其书画作

① 1911年11月25日《申报》,见《选辑》第630页。

② 1911年12月5日《申报》,见《选辑》第633页。

③ 1911年12月10日《申报》,见《选辑》第635页。

④ 1911年12月7日《申报》,见《选辑》第633页。

⑤ 1911年12月5日《申报》,见《选辑》第680页。

⑥ 1911年12月9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66页。

品所得之款,悉充军饷。艺术界如戏剧、说书、弹词等艺人则举行一天、三天或更多天数的节目演出,以收入捐助军需。佛教界提出“设建水陆道场四十九昼夜,所得礼佛香火之资,悉数作军饷”^①。妇女组织女子后援会、女界协赞会、劝募手工御寒品会、女子募饷团等,进行劝募活动。有的妇女献出自己的饰物金环、金钗、金戒指、珠花等;有的贫苦妇女也慷慨解囊,将仅存的一点积蓄献出来;还有一些妇女为革命军赶制手套与围巾。儿童们也不落后,有些甚至把购买糕饼之费节约下来,集成一元捐献,“略表寸心”^②。

各界人民竞相捐输,有助于军政府克服面临的财政困难,补充了军饷的不足,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表现了他们的革命热忱。可是,大资产阶级却爱财如命,不肯出资支援革命战争,因而实际上加重了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负担。有些行业不论各人收入多寡,一律按月薪抽成捐献。如旅沪广帮集议,“凡有家眷及开行号者,如月须开支百元,则以十元助饷。各业伙友及出店仆役人等,概以每月入款捐助十分之一”^③。布业也议决,“除特捐外,愿按饷月减薪一二成,每逢初旬汇送至财政处,借充军饷”^④。这对那些收入低微的职工来说,势必增添困难。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⑤上海光复后,革命群众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乎遍于城市各个阶层,工人、学生、商民、知识分子和妇女等都卷进运动中来,“人民民气旺盛”^⑥。他们要求彻底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

① 1912年1月22日《时报》,见《选辑》第674页。

② 1911年12月9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50页。

③ 1911年12月5日《申报》见《选辑》第632页。

④ 1911年12月11日《民立报》,见《选辑》第6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⑥ 《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8页。

主共和国。如各个军事团体，或“以灭满兴汉、建立民国为目的”^①；或“以扫除专制，造成共和，并除去凡为共和之障碍，而保持世界之和平为宗旨”^②，反映出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显然，当时群众运动是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各界人民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从事斗争的。工人阶级也不例外，他们“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③。

与城市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上述群众运动在农村没有得到多大反响。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长期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既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土地纲领，满足农民的要求，又没有深入农村，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群众，即使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集中和强大，但他们在农村的影响仍很微弱。

尽管如此，上海人民为支援革命而作的种种努力，对于增强上海的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形势，对于扩大革命影响，支援江浙诸省联军攻取江南的重镇南京，对于加速全国革命进程，开拓新的局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上海的光复，直接推动了江浙诸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上海同江浙诸省组成联军进攻南京，就“设总兵站于上海，担任后方勤务”^④。前线战斗的胜利，南京转入革命党人的手中，并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诞生地，是与上海人民不断地从后方以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支援紧密关联的。上海和江浙诸省所取得的进展，又有力支持了武汉地区的对敌斗争，促使全

① 1911年11月8日《民立报》，见《选辑》第559页。

② 1911年12月25日《民立报》，见《选辑》第567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2版（下同）第665——666页。

④ 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16页。

国革命局势继续高涨，清朝政府再也无法挽救自己的灭亡命运。事实证明：“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①

四

随着民主革命潮流的高涨，广大群众在支援革命的同时，也迫切要求推进革命，为摆脱身上的沉重枷锁而斗争。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革命，但处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所以，他们不得不起来抗争。这种斗争，首先表现在反抗工厂里存在的封建性压迫，譬如，江南制造局炮厂管理与炼钢厂经理等乘革命军占领该局之际，竟苛待各厂工人，十一月九日，工人相约反抗，并痛打炮厂管理。随后，龙华火药厂工人也反对工头、司事的虐待，要求查究，厂方只得将其革职。工人的斗争，也表现在经济罢工方面。十一月下旬，合盛丝厂女工三百多人举行罢工，要求补发积欠工资，厂方被迫如数发给。翌年二月，瑞丰丝厂工人因厂主扣发工资而罢工。六月，排字工人“以米珠薪桂，月得工资不敷用度”^②，要求增加工资。七月，翻砂工人由于“工资最贱，而作工时间则每日至少须十五六点钟”^③，举行罢工，很快迫使多数厂方答应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同时，豆腐业工人也因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

在民主潮流的影响下，工人阶级还参加政治团体活动，或成立自己的组织。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工党在上海建立后，便有翻砂、缫丝等行业的工人加入。其名虽曰“工党”，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控制的、主张“劳资调和”的群众团体。接着，江南制造局工人发起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陆续参加者达千人以上，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② 1912年6月9日《申报》，见《选辑》第693页。

③ 1912年7月15日《申报》，见《选辑》第694页。

他们开会“演说之词，则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指制造局）比资本家，劳动家须脱离资本家之钳制；并有谓工匠制械，光复功归局员，犹之兵士死战，而功归官长等语”^①。这说明他们已初步提出自己同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和力量。军政府对此十分害怕，严禁成立这一组织。三月，都督陈其美闻到处风就发布禁止私立“邪会”的告示，六月又明令查禁，借口制造局“本直隶于陆军部管辖，局中所有员司以迄工匠，自应与军属同视”，“所有结社、集会，更不得受正当之制裁”。他命该局总理查办，“严行禁止，设法解散”^②。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李平书“始则劝令解散，继则严词威吓”^③，说要“恪遵都督指令查明，从严律办”^④。制造局工人为此提出强烈抗议。他们严正声明，“谨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四款之规定，集会、结社为吾人之自由权，决非命令所得侵夺。”^⑤并于七月召开成立大会。陈其美、李平书只得让其暂时存在。

这时的工人运动，主要是反对人身虐待和举行经济罢工，因为工人阶级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认识依然处于感性阶段，还不可能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提出自己的斗争口号和革命纲领。不过，他们已经要求成立自己的团体，有了新的觉醒，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反映出工人运动正处在从自发向自觉转化的前夜。工人的斗争，在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取得一些成果，但有的成果不久又失去了，如制造工人同盟会等于一九一三年为袁世凯政府所解散。他们仍然陷于受压榨的苦难境地。

农民的抗租风潮，席卷了农村广大地区。上海军政府在刚光

①② 1912年7月1日《申报》，见《选辑》第357页。

③ 1912年6月23日《申报》，见《选辑》第689页。

④ 1912年6月23日《申报》，见《选辑》第528页。

⑤ 1912年6月23日《申报》，见《选辑》第689页。